

溯源甘肃

■ 简牍,作为纸张普及前华夏文明的重要书写载体,是触摸真实历史、解码古代社会的珍贵实物。甘肃是中国简牍大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2万枚汉简中,甘肃出土约7万枚,占比高达58.3%。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汉魏时期的屯戍与交融,让这里成为简牍出土的核心区域,一枚枚木简承载着边塞的军政民生、制度智慧与人文温度,成为镌刻在陇原大地上的文明印记。

本文以甘肃省档案馆珍藏的216枚汉魏简牍为主,循简牍墨痕,探河西文明,串联起近三百年的岁月脉络,从物资收纳到邮驿传递,从刑徒管理到戍卒生活,字字句句皆是鲜活的历史细节。

木简载史 墨印留痕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杨生俊



055号《筑武三年戍卒患病简局部》

216枚简牍的诞生,源于汉代完善的政务运作体系。从内容来看,它们涵盖了军政要务、民生琐事、制度规范、人情冷暖等多个维度,堪称汉魏时期河西走廊的“活态百科全书”。216枚简牍的汇聚,并非单一考古发现的结果,而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文化接力。通过馆际调拨、民间征集、公众捐赠等多渠道,让这些散佚于各地的文化瑰宝最终得以集中保存,每一枚简牍都藏着动人的故事。

河西走廊,这条横亘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的狭长通道,自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设河西四郡以来,便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战略要地。“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的国策催生了庞大的屯戍体系,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西地区已形成“郡—县—乡—亭—隧”五级管理网络,临北亭、悬泉置等基层节点上承县府政令,下管烽隧戍卒,承担着治安巡逻、物资转运、驿传接待等多重职能。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多民族交融的前沿,军政事务的繁杂、物资管理的精细、信息传递的迫切,使得易于制作、便于携带的木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书写载体。红柳作为河西地区常见的耐旱植物,因其材质坚硬、易于书写,成为边塞简牍的首选原料,这既是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其中,一枚长22.7厘米、宽1.1厘米的红柳木简格外引人注目,筒身23个隶书文字历经两千年风沙侵蚀仍清晰

可辨:“入茭卅九束 元始二年正月庚辰施刑许峻受临北亭长卅”。这枚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文书简,以其精确纪年、完整流程记录,成为第一批甘肃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核心入选者,2015年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为解码汉代制度提供了样本。

除这枚“入茭”简外,馆藏简牍中还有“阳朔二年八月丁未服之隧长武政言之”的规范化公文,记录着基层官吏的履职流程;“步乐隧卒周贺迺甲戌夜病寒”的边塞医疗记录,还原了戍卒的健康管理细节。

简文“出蒲书一封奏一枚,景初二年六月一日蚤食时,卒杨元升付悬泉邮卒”,不仅是目前已知纪年最早的三国曹魏简牍,更详细记录了邮驿传递的时间、人员和流程,生动再现了1700多年前敦煌悬泉驿站的繁忙景象。全国已发现的曹魏简牍总数仅数十枚,这枚简牍的发现填补了曹魏时期河西走廊邮驿制度研究的空白。

通过简牍,也能够还原汉代边塞的行政流程。例如,简055B路隧长上报隧卒周贺患病一简055A隧长同步上报自身健康状况恳请核查一简001上级下达劳绩核验、病情体察的指令一简003白土县发布教令、候史执行核查一简144士吏层级转发诏书要求亭隧长告知吏民,清晰呈现了“士卒患病上报—上级核查—官府处置”的完整链条,为研究汉代边塞管理体制提供了鲜活案例。

这些简牍或为官方档案,或为私人记述,共同构成了汉魏时期河西走廊的

“立体档案”,为研究丝绸之路交通、边塞管理、多民族交融提供了实物证据。

要读懂简牍的价值,需从文字的精准解读与细节的深度挖掘入手。以上述“入茭”简为例,“入茭卅九束”是“入茭”简的核心事由,“入”即收纳登记,“茭”为汉代对牲畜饲草的统称,《说文·艹部》释“茭,干刍也”,特指经过收割、晾晒、捆束的干草,是河西边塞军政用畜的核心饲料来源;“卅九束”即四十九束,汉代一束茭的标准为长二尺,束大一韦,折合今制长度约46.2厘米,围度为成年人双臂合拢的圆周距离,是经过规范计量的劳动成果。

“元始二年正月庚辰”明确了事件发生的精确时间。元始二年为西汉末期平帝在位时期,此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河西走廊屯戍体系臻于完善。正月庚辰为农历正月初七,正值冬末春初牧草匮乏之际,这四十九束茭草的入库,恰是缓解边塞牲畜越冬饲料危机的关键补给。据《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代西北驻军“月用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足见茭草在军政运作中的战略地位,而“六月省卒伐茭”“茭长二尺束之”的记载,表明伐茭、晒茭、储茭已形成标准化流程,这四十九束茭草正是这一体系高效运转的产物。

“施刑许峻受临北亭长卅”则揭示了文书的权责关系。“施刑”并非刑罚名称,而是汉代刑徒的特殊身份,特指经

皇帝诏书恩准,脱去镣枷、解除赭衣后的施刑徒,他们被派遣至边塞从事屯作、戍守等劳作,享有“作一日当二日”的服役优待,期满后可归原籍。金关汉简记载“施刑屯作居延有‘一日当二日’的优待”,这种“以劳抵刑”的制度设计,既解决了边塞劳动力短缺问题,又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治理思想,是汉代社会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卅”为简牍文书的标识符号,相当于今日的公章或签收印记,证明整个交接流程合规合法、有据可查。

简牍的形制与书写同样蕴含深意。文字为成熟的隶书,笔画规整、结构匀称,虽为政务文书却不失书法美感,反映了汉代基层官吏的文化素养;简首的墨点“·”表明其原为册书的一部分,是某份饲草收纳账簿的单枚遗存,印证了汉代“编简成册”的文书管理制度。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汉代政务运作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基层治理的严谨与规范。

从制度层面审视,“入茭”简虽为普通物资接收文书,却折射出汉代完善的治理体系。物资管理上,“物有登记、事有记录、责有人负”的模式贯穿军政、经济、民生等领域,构成古代中国档案管理体系的雏形;行政体系上,“郡—县—乡—亭—隧”五级网络保障了政令传达与物资调配的高效运转,展现了汉代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刑徒制度上,宽严相济的设计既维护法律威严,又给予刑徒改过自新机会,其蕴含的治理思想历经千年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佐证价值来看,简牍为研究汉魏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空白,尤其是精确纪年使其成为断代研究的“标准器”,构建起汉代河西历史的精确时间轴。

在制度研究层面,简牍生动诠释了汉代的档案管理制度与行政效率。汉代将政务文书视为“国之重器”,形成“制作—传递—签收—归档”的完整流程,这种重视凭证、规范管理的传统,为后世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以劳抵刑”的刑徒制度、标准化的物资管理流程、高效的邮驿传递体系等所体现的治理智慧,更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其文化价值更体现在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见证上。简牍作为纸张发明前的主要书写载体之一,承载着秦汉时期的文字、书法、礼仪等文化信息。“入茭”简上的隶书介于秦隶与汉隶成熟体之间,是研究汉字演变的重要实物;私人书信中流露的人文关怀,让冰冷木牍充满人情温度。这些文化元素历经千年传承,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这些简牍是丝绸之路的“源文件”。“张掖郡”“悬泉置”等地名串联起古代丝路交通网络,“蒲书”“奏书”等记载展现了信息传递的高效,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文明互鉴的早期见证。

这216枚简牍所见证的,是一个王朝经略西域的雄心壮志,是一套制度高效运转的治理智慧,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简牍里的寻常事

文/杨媚

作为纸张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书写材料,简牍(包括少量帛书)的使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依靠竹木简牍,中国的古老文明得以记载,古人的思想文化得以流布,祖先的知识智慧得以传承,优秀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本文将选取甘肃简牍博物馆所藏的三件文物,讲述简牍中的鲜活故事。

《元致子方书》

这是一封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书信,是一名叫“元”的下级军吏写给他的朋友“子方”的,信写在帛书上,是目前所知两汉地下出土文物中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信件。

在信中,元拜托子方为他办以下五件事:第一,由于自己将要去敦煌屯戍,没有合适的鞋子,所以请子方代买一双鞋,大小是一尺二寸,鞋里得是绢帛,鞋面得是牛皮,这样既舒适又结实,能经得起长途跋涉,买好后请子方带给同事捎回来;第二,请子方为

自己挑选五支品质良好的毛笔;第三,拜托子方去一位叫次孺的人家探望并请次孺回信,如果次孺不在,就请他的妻子代为回信;第四,有一个叫吕子都的人想请子方刻一枚私印,但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拜托元代请子方刻一枚印文为“吕安之印”的印章;第五,说郭营尉寄了二百钱,请子方代买一支响鞭。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册》

这是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一份东汉初年的法律文书,文书的原告与被告分别是粟君和寇恩。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二月,一个小官吏甲渠候粟君雇了一位居延县名叫寇恩的百姓去犍得县替自己卖鱼,当时议定的工钱是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要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没有卖够这个价钱,卖掉赶车时抵用工价的那头牛后才凑了三十二万钱,还差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第二年的十二月,粟君却向居延县控告状,说寇恩欠牛不还。

居延县廷收到粟君的起诉书后,要求寇恩所

在的都乡查明情况。在问案的过程中,寇恩声称自己早已还清了债务,理由是卖鱼时同去的还有粟君的妻子业,途中寇恩给业买过十斤肉和两石大麦,回来时还为她赶车没有收费,而且自己的儿子为粟君捕了三个多月的鱼,却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加上被粟君扣押的车器杂物,早已超过了所欠的八万钱,况且牛本来是抵用工钱的,根本不牵扯赔偿问题。乡里专管刑狱的官吏也判定寇恩无罪。

粟君看到这个判决后不服,上诉到更高级的太守府,太守府令居延县重查,居延县下令让乡里重新验问,寇恩坚持陈词,而乡里也维持原判并上报。

《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

这是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一份册书,记录了汉宣帝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招待长罗侯部属384人的事项及费用。

常惠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和苏武出使匈奴,被拘押了19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常惠曾多次出使乌孙,处理汉朝与乌孙之间的事务。

长罗侯费用簿的背景是这样的: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乌孙王翁

归靡通过常惠向汉朝上书,为其与汉朝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求婚,这桩婚事有助于汉乌关系,于是朝廷答应了这个请求,最终选定了解忧公主的侄女、元贵靡的表妹相夫作为和亲公主,并为和亲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来朝廷派遣时任光禄大夫的长罗侯常惠等人护送和亲公主到敦煌,但是还未出塞,就听说翁归靡去世,而乌孙并未按事先的约定立元贵靡为王,汉朝经过讨论,送和亲公主还朝,和亲之事就此搁浅。

翁归靡死于公元前60年,而《过长罗侯费用簿》所记载的时间,恰恰在前一年的正月,悬泉置接待了长罗侯的384人的大型使团,这个使团就应该与上述的和亲事件有关。简册记载这384人中,军侯以下的各级官吏和戍卒有84人,弛刑士有300人。在这次的接待活动中,悬泉置精心安排,为这些将士提供了丰盛的肴饌。

和亲之事搁浅后,汉乌之间还发生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但长罗侯费用簿,却记载了史籍中所没有讲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事件中具体细微的另外一面。

人和事,是历史的血肉。简牍中有大人物、有大事件,但简牍中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是这些普通的人和事所反映的小历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册(局部)

史、所折射的大历史。他们很可能只留下了一个名字、一件事,但如果将他们放在历史的时空,回归到历史的现场,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气息,也得以感受两千年前真实的烟火人间。